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桑俊,田兆元,蒋明智,等.《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笔谈[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6):34-44.

##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笔谈

### 导言

桑俊<sup>①</sup>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自2006年以来,我国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度,形成了保存、记录、保护和开发利用等探索性、多维性的保护方法。至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实施,系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已基本完成。如果说2006~2011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现了制度化建设,那么,自2012年以来,则主要在传承实践方面进行重要探索。值得一提的是,生产性保护方法、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传承实践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21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指出: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完善调查记录体系。开展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完善档案制度,加强档案数字化建设,妥善保存相关

实物、资料。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专业记录水平,广泛发动社会记录,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全面系统记录。完善代表性项目制度。健全国家、省、市、县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健全国家、省、市、县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以传承为中心审慎开展推荐认定工作。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评估和动态管理,完善退出机制。完善区域性整体保护制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继续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落实有关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促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效衔接,提高区域性整体保护水平。《意见》强调,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加强分类保护。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立区域保护协同机制。促进合理利用。在有效保护前提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

这是“两办”首次联合发文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体现了十九大以来国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思想,也对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科学性、政策性、指导性意见。我们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中山大学蒋明智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孙正国教授对此作学术讨论,回应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践与理论问题,

收稿日期:2021-09-20

① 桑俊(1970—),女,湖北荆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困惑作出论析。

## 非遗研究的理论话语与研究模式

田兆元<sup>①</sup>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到中国政府与民间广泛参与,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大事,其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预期。

近年的非遗保护研究也同步发展。直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篇的期刊文章有三千余篇,具体非遗项目研究的论文,近20年来有万篇之巨量。这些文章,从最初的非遗保护概念诠释,到非遗分类问题的讨论,以及非遗保护的意义与功能的阐述,对非遗保护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论文的最大特点是围绕非遗保护的中心工作展开,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如,关于传承人、非遗保护法、非遗生产性保护、非遗扶贫、非遗进校园、非遗乡村振兴,等等。因此,这些年的非遗研究,整体上是与非遗保护同步的。

针对非遗的其他理论研究,则多是根据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予以讨论。如,以国家与社会理论讨论非遗的国家在场与社会的策略对应,以“传统的发明”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问题,用“民俗主义”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领域的应用,用语境理论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文化背景,用表演理论和仪式过程理论来解读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庆仪式以及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艺活动,等等。这些研究、努力很可贵,但是也明显有不足。用国外的本来与非遗保护不太相干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非遗保护问题,也是不合时宜的。毕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全新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问题,更是恰逢中国文化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全新的国内与国际社会文化背

景。难道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或者根据国外的理论生硬套用,或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依葫芦画瓢?难道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就不能有自己的话语表述方式吗?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民众的创新精神、独特的智慧以及灵巧强大的能力。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连自主的学术表达方式都没有,那我们这一代人真是思想贫乏,这是非常惭愧的事情。那样的话,也是不能很好地传承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的。《意见》第九条明确提出:“完善理论研究体系。统筹整合资源,加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研究力量,建设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sup>②</sup>这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的坚决有力的方案。

现实中,我们梳理非遗保护传承中的问题,就会发现理论贫乏是最大的问题。这是自非遗保护以来我们非常关注的。结合民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有必要在此讨论,在此分享。

第一,以文化精华与文化精英为基础的优秀传统文化定位观。“两精说”对于认识民俗的本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庸俗的定位于鸡毛蒜皮的传统文化观,长期制约着文化传承保护与研究水平的提升,也让传统文化长期处于文化视野的低端。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明确以文化精华与文化精英观念来研究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已经把民俗传统提升到文化精华的境地。”<sup>③</sup>“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那都是文化精英,他们掌握民俗文化的水准,是普通的民众无法达到的,无论是表演,还是手工技艺,他们个个身怀绝技,都是才艺高人。无论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文化的精华;无论是国家级传承人还是地方级传承人,都是文化精英,这是不容置疑的。”<sup>④</sup>非遗作为文化精华,非遗传承人作为文化精英,我们在相关文章中明确提出来了。后来,我们逐渐确定了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的“两精说”：“民俗不是日常生活，

① 田兆元(1959—),男,湖北宜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俗学、非遗保护研究。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http://www.wenming.cn/bwzx/dt/202108/t20210812\_6141792.shtml。

③ 田兆元:《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民俗超越日常生活,是生活的华彩乐章;民俗是精英创造,民众认同并共同完成的文化形态;民俗不是通俗文化,民俗是高雅文化,民俗不俗。因此,民俗文化是精英文化。”<sup>①</sup>这种对于民俗的定位,是在民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门类后的全新定位。强调历史上长期传承发展的文化精华,强调精英创造,民众认同并共同完成。共创、共传、共享,这就是文化精英与民众共同创造文化的恰当描述。确立了这样的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进程研究、非遗传承人的养成之路探索也就顺理成章。

这与学界普遍强调外来的“民俗日常生活说”大异其趣。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日常生活境界的提升,着眼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两精说”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恰当评价,也是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这种定位对于非遗的传承与传播都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普通的日常文化事象传承研究的意义是有限的。

第二,“叙事以认同”的非遗形式功能观。叙事以认同的非遗形式功能观找到了学科发展与非遗保护的联系,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路径和保护方法。叙事以认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奥秘。叙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有何种可以挖掘的地方呢?我们起初是从传说入手,将叙事分为三种形态,即语言文字的叙事形态、仪式行为的叙事形态以及景观图像的叙事形态。以大叙事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理解成一种文化传统的叙事,强调非遗是一种传统文化叙事。我们把叙事理解为文化的表达和传承方式,不仅语言类的民间文学、戏曲是经典叙事,传统美术、手工技艺都离不开叙事,而民俗也是在讲述中国故事,是仪式叙事、景观叙事的统一。比如,一项手工技艺的程序,包括技术、文化、市场等环节,是一个复杂的叙事谱系,而这个手工技艺叙事谱系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口碑,也就是品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的非遗形式都是叙事,因为它们都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文化认同,口口相传,成为真正的活态

的文化传统的叙事。因此,我们将文化遗产定位为文化传统的叙事。<sup>②</sup>

确立了非遗的叙事视角,我们就有了立体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也就找到了非遗保护的某种路径。以民间文学为例,过去只注重语言文本,现在我们考察其仪式行为,如人们在断桥约会,杭州断桥的旅游,实际上就成为一种行为的叙事传承方式。现在所谓文旅结合非遗传承,很大程度上是行为的传承。人们到杭州旅游,很大程度上是为白娘子而来。旅游的行为,传承的是白蛇传的传说故事。但是,更重要的,还有景观的叙事。断桥是相对完整的存在,但是雷峰塔曾一度倒掉,只有叙事存在,景观不存在,后来便有雷峰塔的重建。于是,我们在非遗研究中将景观叙事向景观生产拓展。<sup>③</sup>因为没有景观,叙事就无所附丽。在今天,为传说造景,已经蔚成风气。事实上,景观生产已经成为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形式。为传说造景,并不是今天的发明,雷峰塔在古代也有兴建、重修的过程。

这种叙事生产与认同的过程,就是文化遗产内涵不断叠加的过程。这种认同,往大处说,有民族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的意义;小一点说,有地方认同、地方建设的意义。今天,地方政府对于非遗保护表现出的热情,有明显的地方营销的意义,同时也有明显的借助非遗保护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非遗经济是一种认同性经济,即通过大量的叙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类的手工艺、美术、医药等非遗产品形成良好的口碑,形成符号认同;同时,通过大量的叙事,大量的非遗节庆及其民俗事象形成消费认同。这就是非遗经济发生的奥秘。通过大量的语言、行为和图像景观的叙事,形成认同。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问题,将在认同性经济的视角得到解释。<sup>④</sup>

当我们从“叙事以认同”的视角看,非遗经济就远远不止手工技艺、美术和医药三项,民俗类的节庆、文学类的传说等,可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比

① 田兆元:《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

② 田兆元:《作为文化传统叙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群言》2019年第10期。

③ 余红艳:《走向景观叙事:传说形态与功能的当代演变研究——以法海洞与雷峰塔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④ 田兆元:《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如,春节就是一个巨大的民俗类非遗消费平台,哪一个节日能够有春节那么大的消费能级呢?这就是因为春节的叙事与仪式行为太强大了。

第三,谱系观是非遗保护的根本理论之一。文化谱系观经过学界的努力,现在已经成为一些学科的热词之一。谱系观本来就在“传承谱系”这样一个非遗保护工作的热词之中。我们从文化的整体性、多元性、联系性与互动性的角度考察谱系的构成,就会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世界。比如,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谱系、空间谱系、族群谱系与形式谱系,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的非遗保护工作遗漏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楹联习俗”这一非遗项目归在民俗类,已经扩大了认识空间,楹联不仅有文学的对句艺术、书法艺术,还是民俗。但是,我们见到的楹联还远不止编撰、书写那么简单,挂出来的还有裱装形式、镜框形式、竹刻形式、木雕形式等,这就是说,楹联还是一种制作技艺。从这个角度看,它还是一种美术。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以为端午竞渡就是龙舟竞渡,这是对于非遗时间谱系缺乏考察的典型问题,也是对于舟船形式谱系缺乏考察的问题。从历史来看,端午竞渡最初的舟船是鸟舟,也就是我们后来俗称的“凤舟”。至少在唐代,端午竞渡还是以鸟舟为主的。龙舟大规模出现,是在北宋以后。南宋以后,龙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凤舟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流行,如湖北、四川、福建、江西、浙江等地。<sup>①</sup>我们对竞渡舟船的形式进行谱系梳理,就会发现龙舟不是唯一的竞渡之舟,凤舟也是端午竞渡舟之一,此外,还有老虎舟、麒麟舟等参与端午竞渡狂欢。假如我们缺乏谱系性视野,非遗传统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就会被扼杀。

在非遗研究中,谱系理论最先用于东海海岛民间信仰谱系研究。在东海海岸和海岛中,妈祖信俗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妈祖信俗在全球有五千多座宫庙(有多种数据表述),有数亿信众。他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又是如何传承发展的?这时,我们就会发现,离开了叙事谱系,离开了妈祖祖庙与各地分庙的谱系关系构建,妈祖信俗是难以良性发展的,我们的研究也是很难把握的。天下妈祖,祖在湄洲。通过宫庙间的层级关系建立,通过朝圣

和巡按等系列仪式,天下妈祖信俗被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妈祖信俗如此,玄天上帝、保生大帝、关帝等信俗,无不如此。宫庙间形成层级权力谱系,不同空间形成特定的信仰格局,也与特定族群联系在一起。这种紧密的信俗关系模式,有力回应了所谓“中国民间信仰分散性”的表述,证明这种说法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在非遗研究中,雷伟平等人的“三官信仰的谱系与认同研究”、张晨霞的“黄河中下游帝尧传说谱系研究”、段友文的“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证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推动了非遗研究自主性理论的进步。

谱系理论何以成为非遗保护的方法论呢?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谱系性的存在。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问题,一定是其谱系结构出现问题。找出这种非遗项目谱系结构的问题所在,有针对性地加以修复,是非遗保护最有效的方法。比如,在端午竞渡中出现单一化、简单化的问题,我们就去考察竞渡舟船的形式谱系构成。同时,通过叙事讲述和仪式展演,端午凤舟竞渡重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中国端午文化博大与多元的内涵就得到了有效的传承。

我们面对非遗保护的名录之困,比如,一个项目不知道从那个口子进入,像龙舟竞渡有传统体育口子、民俗口子,还有舞蹈口子,其实,从哪一个类型进去,都有不足。管理部门机械的口子何不变成开放的口子,一个项目难道不能有多个归宿吗?可以一个类型为主,在表格后面设置一栏“其他关系类型”。现在管理部门似乎想把这个分类搞得更加合理,但是,如果具有文化谱系的观念,我们就会知道根本不可能出现一个分得清清楚楚的非遗分类。

非遗保护的发现是在非遗保护的实践中产生的。比如,“仪式美术”的概念,就是我们在上海的区县非遗保护实践中提出来的。有一种美术是为仪式而生的,除了仪式活动中大量存在的美术,景观建筑中的美术很多也是为了某种仪式设计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楹联、春联、婚丧仪式上的对联,难道不是一种仪式美术吗?

所以,我们认为,非遗的理论,其实只要多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就会被总结、发掘出来。理论来源于实践,而不是机械套用,这个道理对于非遗保护理论

① 田兆元、桑俊:《追本溯源——凤舟竞渡暨端午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

的建设完全适用。诞生于中国土壤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还需要进入中国的典籍与田野的资料世界之中。只有拥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才有可能谈论“理论”二字。当然,参考借鉴国外的非遗保护理论,也是很重要的。

## 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议

蒋明智<sup>①</sup>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意见》开宗明义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极高的评价。“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用在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中,是最切时所需的。

《意见》第二部分强调,要“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一共有六个方面。笔者以为,现在要大力推进的是完善区域性整体保护制度。截至2020年,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有23个,广东有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全国还有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和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实验区。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举办各类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保护、宣传、利用好湾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可见,在共建人文湾区的系统工程中,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重要的中坚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相当丰富。广东省已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4项,分别是粤剧、古琴艺术(岭南

派)、广东剪纸、陆丰皮影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47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32人,数量位居全国前列。2017年,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首次公布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共包含20个项目。2017年9月,澳门文化局公布最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涵盖15个项目。至2020年6月,另有70个项目被列入清单内。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含有十分富饶的文化资源:从历史发展的纵轴线看,大湾区有农耕文化、海洋文化、侨乡(移民)文化、现代都市文化等;从横轴的地缘关系来看,该湾区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港澳文化,等等。这些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优势,又是大湾区内互联互通,进行深度融合的基础所在。尽管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形势大好,但是,和粤港澳大湾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战略性地位相比,文化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方面还存在明显问题。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联合申报的非遗项目数量少。2009年10月2日,粤剧由广东、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合申报,并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天,粤港澳三地再无联合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非遗资源共享系统不完善,缺乏一个共同展示大湾区非遗资源的专业网络平台。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非遗保护模式相对独立。粤港澳大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一国两制”和三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较弱的条件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保护模式,不利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化、系统化。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现提出来,仅供参考。

第一,科学规划发展,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国家文旅部2019年颁发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指出:“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

<sup>①</sup> 蒋明智(1966—),男,广西桂林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非遗协同保护工作的职能。

优惠型的税收政策、非遗保护资金的投入、粤港澳三地人才智库的建设、非遗联合展示平台的搭建,等等,都需要政府统筹发展、宏观调控。在政策层面,粤港澳三地政府应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和文化圈地主义观念,根据自身非遗保护发展实际,研究制定出相应的协同保护合作政策。目前,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是三地文化合作的主要机制。

第三,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非遗保护专门性法律建设。

珠三角九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处于三个不同行政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三套不同法律制度管辖,如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专门性法律,将有望实现三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方法、非遗资助规则、资金管理等环节的完全衔接,有利于三地非遗协同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四,加强非遗业态化整合。

在联合传播、市场合作、资源共享、信息整合、人才学术交流等方面全面开展互利合作,以达成资源共享,形成有效的非遗协同保护机制。

第五,发掘和利用大湾区爱国主义非遗资源。

从黄帝铸鼎到舜帝南巡的传说,开启了五帝时期岭南融入祖国版图的认同先河。先秦的五羊传说和扒龙船习俗,为岭南文化镌刻上楚文化的印记。秦代龙母传说,是岭南纳入国家统一,龙崇拜融合中原龙文化的形象叙说。岭南的祖先经过长期发展,锻造了民族、国家统一的早期基础。秦汉之际的赵佗统治岭南,实施“和辑百越”政策,将中原文化、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引进岭南,使岭南地区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也开创了以民俗文化增进南北融合、实现稳定统一的国家治理模式。产生于晋代的黄大仙信仰,成为香港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之下,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今天仍然是大湾区共享的文化资源。历经梁、陈、隋三朝的岭南部落首领冼夫人,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有“岭南圣母”的美誉,被周总理称赞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如今,高州市的冼夫人庙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北宋的妈祖信仰除了福建和台湾,大湾区是最大的信仰圈。妈祖信仰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心灵纽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积极意义。南宋珠玑巷

人南迁的传说,见证了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土地神信仰蔚为壮观,仅高要市就有五千多座土地庙,澳门的土地神信仰长兴不衰,成为地方、区域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

众所周知,代表中华民族捍卫国家尊严、维护民族统一的南宋文天祥和明代郑成功,都与大湾区息息相关。文天祥荡气回肠、彪炳史册的《过零丁洋》就是在他被俘船经伶仃洋时所写;郑成功第二次下南洋时,在深圳赤湾海域遇险,幸得妈祖显灵,化险为夷,于是大规模重修赤湾天后宫,使之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妈祖庙,其后每次下南洋,他都在此举行盛大的“辞沙”仪式,以求妈祖庇佑,平安返回。这些遗址和英雄的壮举一道,共同构成了爱国主义传承的文化生态。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屈辱与苦难,湾区人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爱国主义壮歌。三元里抗英、洋人盗宝传说、太平天国运动、冯子材抗法,是近代中国具有标志性的事件。爱国诗人黄遵宪、为“召唤时代新民”呐喊的梁启超、领导推翻帝制的孙中山等,关于他们的传说层出不穷,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近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岭南更成为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省港大罢工、统一广东之役、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起着重要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铭刻着苏兆征、叶挺、彭湃、周文雍、杨匏安、杨殷、阮啸仙、邓发等一大批广东著名共产党人的英雄传奇。与之相关的传说、故事和歌谣,以及表达崇敬和怀念的节日活动,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

就具体方法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思考。加大粤港澳大湾区田野调查的力度,对具有爱国主义元素的非遗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将其作为优先保护和传承的对象,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国民教育体系,编写教材,使之贯穿大湾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并纳入考试或考查范围,将具有爱国主义元素的非遗资源融入人文湾区的建设之中,突出其同源共享性。在爱国主义的主基调下,本着“沟通”“包容”和“团结”的目的,尝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非遗生态区,以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国两制”中的文化力量。



第六,探索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政策措施。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sup>①</sup>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面对新形势,在“一国两制”体制下,主动发展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方针。

坚持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思路,具有如下现实意义。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机制研究,呼应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国家战略,也是深化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理念,加强民族文化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步骤。其次,从文化价值建构层面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非遗协同保护机制有助于大湾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构建社会文化和谐,提升湾区内文化精神。再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自身来看,协同保护机制无疑是促进粤港澳三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加强合作、互惠互利、资源共享的关键举措。此外,站在文化产业发展角度看,探索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发展路径,有利于推动非遗项目产业化发展,促进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打开新时代条件下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思路。最后,从文化旅游发展层面看,粤港澳大湾区非遗协同保护机制有利于湾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整合,有利于推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带动三地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探索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的途径,需要对湾区内非遗协同保护的现状和障碍有清晰的认识。同时,必须摒弃文化保护主义观念和圈地思维。在国家战略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非遗协同保护思路应是利用区域条件和共同的文化资源,面向现代都市生活和现代产业发展道路,积极探索多层次、多方位、立体化的非遗协同保护模式。

为此,笔者从发展规划、业态化整合、对接新媒体等方面寻求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发展的路径。

其一,科学规划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非遗保护

工作需进一步科学规划,统筹好人文湾区发展的大局,重点聚焦打造湾区文化品牌,助推湾区文化繁荣。基于此,我们需要在保护为主与兼顾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与行动力,让古老的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熠熠生辉。除此,应更有信心,更加讲究方法与策略,克服湾区非遗协同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障碍和困难,共同努力使湾区非遗协同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从非遗分布的地域来看,珠三角九市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在非遗文化资源占有方面相对均衡,没有极端不平衡的现象。但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湾区内9个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在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力度(经济投入、政策倾斜等)、非遗文化资源宣传的广度以及非遗文化资源挖掘的深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非遗协同保护方面步调难以统一。针对这一发展现状,粤港澳大湾区非遗协同发展需打破各自的文化本位意识和行政区域限制,统一思想,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突破目前的发展瓶颈。换言之,就是要统筹规划,充分考虑互补性,最大限度地减少协同保护的阻力。

其二,非遗业态化整合。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需要在实践中形成联合意识和协同机制,需要充分发挥湾区非遗文化资源优势,打破行政区域划分界限和文化发展不平衡限制,进行非遗业态化整合,实现湾区非遗协同保护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在联合传播、市场合作、资源共享、信息整合、人才学术交流等方面,全面开展互利合作,以达成资源共享,形成有效的非遗协同保护机制。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联合传播,主要通过政府与民间合力,搭建联合展示和展演平台,推动大湾区各城市文化机构、文化团体、民间社团之间的交流合作。大湾区非遗项目强强联合,实现非遗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形成整体化、系统化传播路径。从打造广州文化高地出发,充分发挥深港澳地区文化市场优势,加快推动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将广州丰富的岭南文化资源带入粤港澳市场,不仅能繁荣都市文化,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凝聚发展力量,为非遗文化创造更多发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展机遇。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资源共享、信息整合目标,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建立一个非遗资源共享的专业性网络平台。粤港澳三地应在非遗项目的传播方面通力合作,互相提供平台资源。在信息采集和整合力度方面,要互通有无,形成统一机制,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非遗人才智库的建设和相关学术活动的沟通与交流。与世界上的一流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顶尖高校数量明显偏少,创业创新性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尤为不足。因此,着眼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长足发展,着手建立人才信息资源库,势在必行。此外,还必须积极推进人才资源信息互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加强粤港澳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非遗文化发展方面的合作。

其三,充分利用新媒体来强化非遗的当代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章第34条明确提出:“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非遗文化传播的主要网络平台分类如下:一是专门机构与保护单位官方网站,如人民网、粤港澳文化资讯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省文化馆网站、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广东文化网、深圳政府在线网、澳门文化遗产网,等等;二是综合性门户网站,如新浪网、搜狐网、新华网、大公网等;三是一些商业性质的网站,如品牌 MAIGOO 网、村村通网、马蜂窝旅游网等,顺带宣传非遗资源;四是微博、博客、网络直播、抖音、手机 APP(如粤港澳文化生活电子地图 APP),等等。在新媒体时代,网民既是信息的发布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每个个体都是单独的自媒体,可以在非遗协同保护过程中承担信息传播的桥梁作用,让非遗传统文化在新的时空领域内重新焕发魅力。

## “人”的智慧与精神:传承人口述志的文化逻辑

孙正国<sup>①</sup>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作为一种制度,在我国实施不到20年的历史。近期,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意见》,这是继非遗名录保护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重大制度、法典颁布实施以来的国家新文献,其意义非凡,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讨论。其中,《意见》的一个关键表述是完善对传承人的记录体系,结合我国的非遗保护经验与教训来讨论,笔者以为,传承人口述志,可能是未来非遗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非遗传承人的关注与研究还远远不够,而他们的声音与智慧,却已在加速远去。

我们有幸在一个好的时代里遇见他们,他们也正好在国家非遗制度中得到前所未有的认可。这也许就是相遇的本义,我们一同见证好的时代,又以口述志方式彼此信任,让非遗的“人”的价值得以自明。

那么,我们遇见非遗,真的就遇见了非遗传承人吗?这可能就是当下非遗保护工作的根本问题了。从有形文化遗产到无形文化遗产,从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有识之士都在寻找“有形”中的“无形”、“物质”中的“非物质”。大家从历史遗存下来的有形的物质中,似乎看到了遥远的时代和那些时代中的人,那些人模糊不清却令今人魂牵梦绕。那些人是从前的人,也是我们的来源。他们创造有形的物质是为了什么?这些有形的物质是以什么方式创造出来的?他们又是以什么态度来认知和接受之前的有形的物质的?非遗究竟是什么呢?

非遗的本质是人,人的智慧与人的历史。

也可以说,认识非遗的前提是认识非遗传承人。

现在的一个误区是强调非遗的“物”,即便认识传承人,也是以认识传承人的“物”为前提。很多讨论还把历史的“物”纳入其中,以至于非遗失其根本,在“物”的观念中一步一步陷入“非常遗憾”的迷茫之中。

在此,我们重申,回到“人”的意义上来。唯其如此,才可能理解非遗,才可能不被市场绑架,不为当代生活所淹没。因为传承人还在当代前行,他们形成了两个互为交错的时间轴:遗产时间与生活时间。遗产时间确立了传承人的遗产继承者的合法身份,

<sup>①</sup> 孙正国(1972—),男,湖北利川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生活时间确立了传承人的当代生活经验。双重时间轴正是传承人的文化特性,记录历史,而又朝向当下。历史维度的非遗显示了“人”的离场,当代维度的非遗则透视了“人”的出场。离场与出场之间,“人”的要素成为非遗的本质。有鉴于此,我们把非遗理解为“人”的形态,而不是“物”的形态。

这也是口述志对于非遗传承人研究的方法论逻辑。

基于非遗传承人的实体,我们先要说清楚非遗的“人”的本质。非遗传承人的“人”已在现实中,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是民俗生活中的客观对象。而非遗的本质的“人”,是抽象的思辨的人,是在创造与传承、发展与创新、交往与对话中以非遗来体现主体价值的那个“灵魂”,是高高在上地与自然、社会、个体产生复杂关系的那种“智慧”,是无所不在地表达着人的独特意义与思想观念的“文化精华”。“人”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非遗得以存在的目的、愿望,以及那些知识积累形成的创造力。而且,“人”的内部有着丰富的结构与多样的形态,书写着不同族群、阶层、民族、国家的不同的非遗的“人”,多样性成为非遗的“人”的总体品格。

另一方面,作为非遗本质的“人”的价值,还在于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果把非遗传承看作历史之河,那么,我们会发现有些河流亘古长流,而有些河流则已枯竭,只剩下依稀可见的河床,象征着曾经辉煌的汇聚之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就成为非遗的“人”的第二品格。

以上述品格为前提,非遗的“人”还寓含着强大的创造力。这种力量称得上人类的伟大力量,是真正的人类生命力,是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包容力,是积聚能量前行的忍耐力与可持续力。

所以,我们把非遗本质的“人”列入历史学范畴,以生命的传承方式来凸显“人”的意义,或者说,以“人”的智慧与能量来标识非遗,使其远离“物”的界定和框范。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是具象而能动的现实形态,实体性存在超越了非遗的遗产属性,活生生地绽放着生命之花,充满力量,富于情感,为非遗的当代实践提供了生活路径。非遗本质的“人”是理性认知,非遗传承人则是感性存在,二者共同确立了非遗研究的基础性原则,即非遗传承人是非遗的中心,“人本观”的非遗原则得以明确。

## 二

自2006年以来,十五年的非遗学术史,从最早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双轨保护制度”研究,到当下的立足于项目和传承人的生态区、生产基地、研培计划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多元研究,以项目个案、民族个案和区域个案为重点,国家主导的保护实践有了长足的发展。“非遗应用”已在学术史之后成为非遗“物化”的热闹场域。显然,以传统工艺和生产性技艺为重点的非遗应用实践,不再是历史性过程的文化延续,而是新时代建构非遗的“物”价值的前沿思潮。非遗的本质认知于是回到了“物”本身。客观地说,“物本观”的非遗保护有着特定的时代语境,突出非遗应用,强化非遗的当代实践,而这两个目的必然以物为基础,否则难以实现应用,也不易进入当代实践之中。

尽管如此,非遗的“物本观”还是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保护传承难题。

首先,非遗的非物质前提与“物本观”形成严峻的内在冲突。非物质前提的本来意义就是“人本观”,强调人的价值与创造性,高扬人的梦想与智慧,主张吸取世代传承下来的人的精神品格与思想成果。也就是说,界定、认知、发掘、传承、传播历史以来的人的知识遗产与思想遗产,接受与践行以非遗为中心的自身传统,理解其中的人的情感、智慧与生活方式,传承其内在的基因层面的价值观,形成本源性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然而,“物本观”的非遗传承将非遗引向表层化的“物”,忽略其精神内核,以技艺、知识的名义将非遗的物质形态从人的智慧中脱离出来,使之最终以物质遗产的价值面世,舍其本而逐其末,从而取消了非遗的文化遗产使命,在当代器用的工具价值中定位非遗,“物”的工具性取代了“人”的精神性,非遗保护落入了实用主义的陷阱之中。

其次,以“物”为中心的非遗保护,关注当代生活实践的市场化路径,正面临巨大的工业化挑战。非遗的“物本观”是一种实操性的观念,强调以传统工艺与知识技艺为核心的物质产品的当代应用价值,经由商品化过程,成为现代市场体系中的消费品。显然,这一市场目标的非遗保护逻辑是现代商品逻辑,即开发非遗的“物”而创造当代消费品。从“物”的应用而言,这一逻辑是符合商品规律的,只不过忽视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工业化生产原则:以大规模、标准化的现代技术生产为基本模式,最大限度地为市

场需求提供多样化的现代商品。因此,坚持市场化路径的以“物”为中心的非遗保护,就可能面临两种结果:一是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市场,产出少,适应小,达不到非遗的“物”的应用目的;二是非遗的“物”全面进入现代化生产过程,依赖机器生产的规模效应与标准化原则,产量大,适应广,“人”的传统意义被全部消除,本质上也就从非遗转为物质遗产了,非遗不再是非遗。

也就是说,当我们从“物本观”出发来保护非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难以完成保护目的。相反,非遗的本质“人”则被悬置起来,保护与传承也就沦为虚妄了。

《意见》指出,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完善调查记录体系。“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专业记录水平,广泛发动社会记录,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全面系统记录。”也就是说,调查记录体系有一个核心任务,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全面系统记录,关键措施主要有三点: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专业记录方法,社会参与记录。就全面系统而言,没有作出明确说明。从传承人口述志记录的角度来看,全面性是指对传承人相关信息的完整记录,系统性是指对传承人信息的关联逻辑的梳理与建构。前者注重对时间、空间、主体、事件等传承人成长历程的多维度信息的采录,信息量巨大,丰富多样,细致入微,真实可靠;后者注重以谱系传承和社会传播的视角观照传承人信息,生命史与精神史互鉴,呈现传承人的心路历程,发掘传承人的文化传统,延续寓于关联项目的“人”的智慧与精神。

### 三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明白,如何保护传承人,如何研究传承人,已成为非遗保护的关键难题。它不仅涉及保护理念的问题,也是保护方法的问题,尤为重要,国家名录体系下的传承人生存与传承现状亟待深入调研,以适时制定出有效的可持续性的保护策略。因此,我们启动了非遗传承人口述志研究项目,旨在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地记录传承人口述志,坚持传承人视角,发掘传承人的精神谱系与生命记忆,守护基于传承人立场的首位言说权,探索基于人心对话的民俗谱系学方法,理解基于非遗体验的民族智慧与文化情怀,书写非遗传承人的心灵史,建设国家文化认同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非遗基

因库,其意义卓越,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

我们所理解的非遗传承人口述志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关键目标。

一是守护基于传承人立场的首位言说权。

非遗保护主体是谁的问题,其实用不着理论阐述,公共文化的设计者与实施者,就是非遗保护主体,显言之,就是政府。相对而言,非遗主体是谁的问题,却有必要做一番细致的辨析。当下对非遗的认识,首先来自于对传统生活的讲述。传统故事,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传统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体育(传统游艺、传统杂技、传统武术),传统医药,传统民俗,等等,这些浸润于衣、食、住、行、用、乐等传统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形式,正是国家非遗名录的十大类型,应该说,这份名录就是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非遗主体,也是各民族各地区的家常俚俗。那么,这种已经上升为国家知识的非遗主体认知,是否就具有唯一的主体地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这些非遗内容只是对象,而不是非遗主体。真正的非遗主体是非遗传承人。由此我们确立了非遗传承人口述志研究的第一个目标,即守护基于传承人立场的首位言说权。

为什么要守护基于传承人立场的首位言说权呢?因为传承人的言说权旁落了,首位言说权被忽视和排挤了。那这种现象是怎样出现的呢?大体上出于两种原因,一是传承人的言说权被他的代言人把握了,时间一长,代言人将这种代言权归为己有,传承人就失去了言说权。二是传承人的言说权一直没有得到发现和尊重,也就没有得到认可,政府、学者、资本以及其他群体分解了这种言说权,大家各执一端,各言其事,各表其理,各不相认,于是,传承人的言说权名存实无。上述两大成因,从代言到分解,根本原因是传承人地位没有得到厘清和尊重。当然,传承人的首位言说权就无从谈起了。我们理解了非遗传承人是真正的非遗主体这个观念,就能够比较深切地体悟到传承人言说权和首位言说权的重要性了。因为非遗是传承人的担当,如何认识非遗,如何保护非遗,如何传承非遗,传承人就理所当然地居于首席发言人的地位,先在地具有首位言说权。

传承人的首位言说权具有独特的非遗保护价值。这种权力事实上规定了非遗保护的基本理念,澄清了非遗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明确了非遗保护主体、非遗保护对象和非遗主体的基本任务。最重要的是,首位言说权取消了非遗保护实践中的各种权力建构,淡化了保护实践中隐藏着各种私心

的“理论逻辑”,简化为单一性线索,即传承人的首位言说权及其简明秩序,非遗保护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保护方案了。

二是探索基于人心对话的民俗谱系学方法。

传承人口述志记录有一个方法论指向。正如非遗实践需要具有普遍意义的操作手册一样,传承人研究也需要从口述志记录中探索可复制的方法。就基础性立场而言,民俗谱系学方法为口述志记录给定了参数与框架,提供了两个维度的口述志记录方向:一是伦理谱系的口述志记录,一是知识谱系的口述志记录。就伦理谱系的口述志记录而言,以传承人为中心,形成亲缘谱系、业缘谱系、地缘谱系和友缘谱系,多重谱系相互交织,伦理机制影响着传承人社会身份的多元结构,深层次地决定了伦理谱系中传承人的价值与情感。这种价值与情感可以锤炼传承人的精神品格,创造属于他个人的独特能量。就知识谱系的口述志记录而言,以知识为中心,形成经验谱系、时间谱系、空间谱系、事件谱系、技能谱系和规律谱系,不同谱系之间的冲突与整合,逐渐凝聚为本体意义上的认识和表述,在知识应用机制中塑造传承人的实践才干和创新意识。知识谱系的接纳与承递,决定了传承人在其传统中的担当意志,以及推陈出新的非凡气质。

人心对话是口述志记录的秘密之约。我们在实践环节中有一个体验性认知,明心见性,推心置腹,让久已尘封的记忆从传承人的积极情绪中得以唤醒,似乎无痕的陈年旧事奇迹般地重回眼前,那些原以为毫无意义的点点滴滴突然闪亮登场,将几十年来盲目前行的困惑层层剥开,曾经的一言一行,受教式地联为一体,心有灵犀,共鸣中将传承人的成长线索清晰地梳理出来,奇妙而简洁。直指内心世界的对话于是建立起来,理解生活,沟通误会,开放胸襟,

正视局限,握手言和。这是一次心灵的旅程,口述志回归心灵志,对话带来的深度精神治疗,以不可思议的方式释放出巨大的生命活力,所有外在的因素都逐渐融化为内在的能量,这也许就是口述志记录的魅力所在吧。

三是理解基于非遗体验的民族智慧与文化情怀。

传承人不仅是一个具象的个体,同时也是一个关联的群体。传承人口述志记录倾向于还原成长中的非遗体验,既通过传承人的表述间接体验,也借助具体项目的参与直接体验,这种体验不是外在于传承人的“他者”感知,而是以口述志记录的方式获取的理解传承人的必要路径。非遗体验正是在间接性感知与直接性参与中得以实施,而传承人对自我的还原式理解也就自然而然地得以完成。那么,非遗体验究竟得到了什么呢?一是传承人的民族智慧,一是传承人的文化情怀。

传承人之所以成其为传承人,是因为他表征着自己的传统,标识着民族的典型特性。国家赋予他代表性身份,其本质是民族智慧的化身。应对自然的丰富实践能力,建构社会的多元组织观念,协调他者的“美人之美”的豁达与包容,皆以多姿多彩的生活形式沉淀下来,智慧成为传承人的代名词。另一方面,非遗体验彰显了传承人的文化情怀。并非所有的实践都天然地携带着理想的光环,令人乐意置身其中而为之追求。口述志记录倡导的体验实践,把传承人深沉复杂的情感过程结构化,使其变作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生华章。也许没有什么比传承人的文化情怀更能激活他生命的能量,点亮他的精神旅程,找到他难以实现的文化理想,即让自己的口述史转化为非遗的传承基石。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